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编长

第四卷 1978-1991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四卷 1978-1991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国新 贺耀敏 刘晓 武力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4卷, 1978~1991 / 刘国新等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201-06467-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现代史—1978~1991 IV. ①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762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50.25印张 5插页

字数: 1050千字

定 价: 270.00元

总编委会

主 编	刘国新	贺耀敏	刘 晓	武 力
副主编	杨凤城	齐鹏飞	丁 明	罗燕明
编 委	钟真真	傅玉能	王树荫	
	张 蒙	林 嘉	夏 潮	
	安建设	李松林	魏新生	
	于剑波	朱立南	孔繁顺	
	刘占义			

第四卷

(1978 — 1991)



第四卷 编委会

主 编 刘国新 贺耀敏

副主编 武 力 陈思训 刘占昌 傅玉能

作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莉	于式力	于剑波	于洪波	于德宝	马学亮
马增科	牛燕冰	王中原	王 伟	王晓明	王新生
王德胜	包 仁	史 青	田景水	刘元春	刘占昌
刘巨才	刘社建	刘国新	刘 眇	刘振国	刘淑云
吕廷煜	吕 微	孙大力	朱立南	江淑丽	汤 涛
齐晓华	齐鹏飞	何虎生	佟 耘	吴少宏	吴 超
吴庭刚	宋士云	宋亚安	张文荣	张守新	张丽
张丽波	张贺福	张桂兰	张 彬	张 蒙	毅 毅
李东燕	李亚军	李 伟	李建辉	李 杰	张 松
李金河	李维国	李雅茹	李 静	苏 浩	林 华
陈思训	周大计	周生玉	周建波	周建涛	邱 宝
武 力	郎青春	郑 华	信长星	柏继平	岳 珑
胡东明	贺耀敏	赵 旭	钟真真	剧锦文	柳广军
梅 冰	章 爰	彭 卫	敬 宏	温乐群	崔 毅
温青蓉	董国政	韩英红	韩 毅	蔡文杰	温秀敏
戴晨京	魏新生				戴国庆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与编者共同努力的结晶。

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存史”。至于怎么存?却是有些说道的。

就共和国史而言,以单一的体裁述说历史,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类社会一旦搭上现代化这趟快车,就不太可能是一个直线的轨迹了,社会的整体性和网络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都决定了历史面貌的立体化结构。为了能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由“总论”、“重大事件”、“文献资料”、“人物”及“大事记”五部分组成。五个部分既是独立的,又能互为补充。

“总论”,顾名思义,是史论,是论说本阶段历史概貌。这部分内容侧

重分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此外,对主要成就的归纳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总论”的题中之义。在写作方法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引论。在对成败的判断上虽然不可能用太多的笔墨,但也不是浅尝辄止。读者通过“总论”会得到一个总括性的印象。

“重大事件”就是按照中国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尽可能完整地揭示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哪些属于“重大事件”呢?首先是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比如“三反”、“五反”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毒运动”;接下来是重要的事件、决策和会议,比如抗美援朝战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再接下来就是治国理念和方略、重要的思想、重要成就,比如“三步走”发展战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等；还有主要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社会习俗、突发公共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防治“非典”、抗震救灾等等。大体说来，前30年因为政治运动较多，一个事件基本上就是一次运动，比较容易独立成篇；后30年国家各项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不再搞运动，所以，“事件”更多的是表现为某个领域的发展、某项政策的贯彻、某一方略的提出。不管是政治运动也好，还是发展方略也罢，它们都是历史的关节点，点点相连，就组成共和国历史的脉络主线。我们在这部分里面还安排了“港澳台”专题，对于1997年前的香港和1999年前的澳门，为了照顾历史的完整性，也作了简单的引述性记载。在编排上，依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几大板块排列，每个板块内按时间的先后为序。

“人物”吸收了传统史学纪传体的长处，简述人物的经历。传主为在共和国创立、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建功立业的人物，也适当地收录了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这里有两个具体的标准，首先是已经去世的，仍然健在的不收。其次是凡党政军系统人物一般按正部级以上出条，其他方面如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学术界的人物则以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为依据，这里面虽然很难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但从约定俗成或公众认可的角度看，还是能够画出一个杠杠的。人

物按姓氏音序排列。

“大事记”是学习传统史学编年史体例，以年、月、日为经，以事件为纬。在遵守通常的编写大事记体例的基础上，本书还有自己的考虑。其一，从史学定位看，本书的“大事记”是中观史学，甚至包括一点点微观事件。因为以全书的互补关系，“重大事件”主要反映宏观史学，那么，“大事记”定位于中观带点微观就是恰如其分的，这充分体现本书各个部分所代表的不同层次。其二，从收录的领域看，“大事记”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外，还有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学术、卫生、体育、民族、宗教、国土、人口、气象等林林总总的事，它编织的是一幅更为细密的网络。“大事记”有部分内容同“重大事件”相重复，本书的处理办法是，凡“重大事件”已有的，“大事记”一概从简。

“文献资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组织沿革和职官，以及研究成果总目。

本书的九卷分别是“重大事件”六卷：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第三卷（1966—1978）、第四卷（1978—1991）、第五卷（1992—2002）、第六卷（2002—2009）。这种分法，不是本书的独创，完全是参照近些年学术界，包括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关于阶段的划分法，同时也自觉这六卷的编排无论从其所呈现出来明显的阶段性，还是从国

家最高层级的对应上也还说得过去。第七卷为“人物”卷，第八卷和第九卷为“大事记”卷。

粗粗算来，国内对于共和国史研究有近 30 年了，出版著作百十来部，时间和数量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志，还很难说，因为绝大多数著作都是教材。我们认为，共和国史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按史书范式写出一批论著是基本条件。本书不敢妄谈水平多

高，但宽领域、多视角的记述，多多少少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几所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本书每隔 10 年重新补充修订一次，长此下去，也会成为一个可观的文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

(第四卷 1978—1991)

目 录

总论	(1)
辉煌的十四年	(1)
重大事件	(20)
改革开放决策初步酝酿	(20)
实现历史转折	(36)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52)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65)
国民经济“跃进”与新的调整方针	(73)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8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00)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8)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	(131)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完成	(138)
城市体制改革初步实施	(146)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157)
财政体制改革	(171)
金融体制改革	(181)
价格体制改革	(184)
劳动制度改革	(188)
分配制度改革	(200)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210)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完成	(220)
政治体制改革	(233)
教育体制改革	(244)
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进步	(250)
军队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	(257)
扩大对外开放	(274)

外贸体制改革	(292)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449)
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296)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周边国 际关系	(453)
对外双边和多边经济技术合作	(304)	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46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	(314)	中英谈判与香港问题的历史性 解决	(470)
实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323)	中葡谈判与澳门问题的历史性 解决	(476)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2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481)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 委员会	(354)	三峡工程的论证与立项	(489)
治理整顿全面展开	(363)	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499)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颁布	(373)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形成	(507)
民主与法制建设	(379)	人口与计划生育	(512)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90)	社会与环境	(524)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395)	台湾地区概况	(537)
体育的崛起与腾飞	(406)	附录	(600)
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成就和 任务	(415)	党、政、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组织沿革和领导成员	
军队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	(427)	名录	(600)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436)	国史研究论著索引	(745)
中美关系的发展	(444)		

总 论

辉煌的十四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它结束了党在基本指导思想上的痛苦徘徊和各项工作难以开展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从指导思想上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宣告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

一

不平凡的前进历程

回顾我们走过的1978—1991年的十四年，是极不平凡的十四年。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十四年，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十四年，是思想观念和实践开拓大踏步跨越的十四年。我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难以历数，目不暇接。

十几年来，我们：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平反了各种冤假错案，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领导我们进行新的长征。

——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确立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个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定并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开展。农村长期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经济模式被突破,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建立,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象。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起步,经过经营承包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探索和改革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以及试行社会保障制度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也有很大发展,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积极参与国际的经济技术及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带以及内陆中心城市,共同组成的中国经济的梯度开放蔚为壮观。

——依据我国国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共同富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蓬勃发展;以按劳分配为

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进一步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流通体制的改革从增开渠道、减少环节入手,逐步展开。全面推行价格机制改革,主要工农业商品价格均已实现由市场定价和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其他如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也正在发育成熟。

——挣脱固有的思想禁锢,借鉴海外一切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使竞争、破产、股份制、市场机制和其他世界通行的做法,在我国得以存在和发展。这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为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创造了条件。

——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在确保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产业部门和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村实现小康的有力保证。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日益活跃。国内消费品市场繁荣。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我国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初步解决后,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科技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成果大批涌现,科技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

——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后,带动并促进了大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层次、多渠道教育蓬勃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正在形成。

——干部制度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废除了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干

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加快。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实施。政府转变职能的任务已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步推进。一大批经济法规和法律制定出台，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被纳入法制化轨道。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不仅使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而且也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解放军按照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走上精兵之路。他们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职业。

——“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构想。中英、中葡分别签署了联合声明，结束了英、葡分别在香港、澳门的殖民统治，并使中国在1997年、1999年先后恢复行使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得到改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在国际关系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改善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原则、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广交朋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十四年来，我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数不胜数、举世瞩目。十四年来，是我国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人民生活提高最显著的时期。

正像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在：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二

高奏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

十几年的历史，是以改革开放为时代主旋律的历史。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和弊端

计划经济是特定历史环境中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实施的经济体制。其最基本的历史依据，就是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尽快启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实行的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国家的指令性直接计划，是所有生产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和经济决策的唯一依据。衡量和评价一个微观经济单位的好坏，就是看它完成国家计划的好坏。

在农业生产中，这种体制集中体现为两种强制：一种是生产组织强制，即国家通过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强制推行人民公社组织，使农民服从国家统一安排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内容，农民的经济活动缺少自主选择的自由；另一种是劳动成果

强制,即国家对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实行严格的统购派购政策,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控制在国家手中,禁止农副产品自由进入流通领域。

在工业生产中,这种体制则分别表现为:国家严格地控制着工业企业,并通过直接计划和行政管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级国家或政府机构,分别被定为科级、处级、局级甚至部级单位,企业的负责人也相应享有同等的政治待遇和行政权力;企业同生产要素市场不发生任何关系,计划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调拨,企业成为国家这个大工厂或总公司的一个车间;国家办企业,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企业没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国家包揽了企业的一切经济后果;国家在确定发展战略时,始终以重工业为重点优先发展,导致重工业超常规发展,经济发展始终是以数量型增长,而非效益型增长为主;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以自我为市场,形成封闭的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系统。

在我国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计划经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工业、农业是如此,其他部门和行业也是如此。商业、金融、外贸等部门,同样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控制。在商业中,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商业渠道单一,组织落后,服务很差,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在金融业中,国营金融机构一花独放,非国营的金融机构不能存在,投资体制和融资机制唯行政命令是从;在对外贸易中,主要由国家垄断进行,从事政府之间的易货贸易,尽量回避和绝少参与国际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竞争。整个国家经济均服从计划经济的调节和安排,虽然有序但缺乏生机与活力。

历史地看,这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曾经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过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即它具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集中计划、动员、调动和配置经济资源,以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较快较大的结构变动;它具有有效地确保人民迅速地摆脱极端贫困状态、实现较高程度的收入分配均等化能力,以消除因社会变动而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它具有强大的应付经济突发事件和克服经济严重困难的能力,对于较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和初级工业化启动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现实生活的发展,并不完全遵循人们的良好愿望。计划经济也是一样。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只适用于较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具体地讲,它只适于非常规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需要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这种特殊环境。它不能也不可能适应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事实上,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5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即在这种体制形成后不久,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后,国家曾多次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由于我们从未认识到这种阻碍,源于计划体制本身,所以总是在由中央集中计划,还是由地方集中计划上兜圈子,即在放权和收权上摆来摆去。正是因为如此,以往历次的调整,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弊端,在60—70年代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和尖锐了。其结果,便是经济发展缓慢。从1957—1978年,我国职工平均年工资由637元增至644元,21年只增长了1.1%,同期职工生活费指数却上涨了5.9%,从而使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农村居

民的生活状况则更差,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处于贫困状态中。

具体说来,计划经济积弊之一,它严重地压抑并扼制了经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各种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农户和个人)日益缺乏自由从事和选择经济活动的权利,从而使各种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越来越丧失活力,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积弊之二,它一味追求重工业发展和高速度,严重地压制了农业的发展,通过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加重农业赋税等方式,强制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采取强制方式,而不是采取经济诱导方式(即通过金融机构动员储蓄的民间积累),在农村中集中农业剩余,提高资本积累能力,这种做法是借取苏联的对农业“拧紧螺钉”的方法,不仅遭到农民的抵触和抵制,而且也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

积弊之三,它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和现代经济的基本要求,使工业长期脱离农业超常规发展;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异常发展,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失衡。在这种格局中,虽经中央政府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多次调整,但问题依然存在,调整很难有什么成效。

积弊之四,它虽在短期内,可以做到使经济资源符合某种战略需要的配置,但是从长期来看,则根本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计划缺乏科学的依据,逐渐蜕变成上级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从客观上讲,在现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经济供求关系的预测和决策,要做到万无一失、十分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对全部社会生活的计划管理,只能使中国经济的资源

配置方式日趋失灵并僵化。这种状态被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

以上种种表现,都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它产生于这种体制本身,并不是外加的。可见,不彻底改变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要想赢得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2. 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山重水复中开始的。它并不像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实践准备,它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由局部到全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开放的目标逐步明确,改革措施逐步出台,思想理论逐步成熟和完善。一句话,我们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通往彼岸的新路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在这个问题和选择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飞跃。党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基础非常落后、有着11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也不可能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模式,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1978年开始,我国有步骤、分阶段地开始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在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牺牲农业与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维持的。这种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工业化,也就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不可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的稳定、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公社成了我国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的基层组织,一味追求“一大二

公三纯”，对农民的个体劳动积极性和个体经济发展愿望长期压制打击，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十年动乱中，农民从集体分配中得到的人均年收入，一直在 60 元左右，1976 年农民人均分配只有 62.8 元，其中现金仅占 23.7%，即每人只有 14.9 元。全国大约有 1 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非常困苦。历史又一次把农民和农村问题推到了最前端。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发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了。

① 农村经济蓬勃发展

农村的变革真好像是一种纯粹的历史偶然。1977 年的春天，安徽省遭遇了少见的干旱威胁，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折腾，当地的许多农村，已难以应付这样的自然灾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怎么办？是让他们外出乞讨谋生，还是另外寻找一种稳定人心的权宜之计？在当时“左”的思想仍很盛行的政治空气中，少数生产队冒着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他们不曾料到，这一“包”，包出了我国农村生产经营的崭新阶段。“包产到户”受到了农村广大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在 1978 年安徽全省超纪录的大旱中，“包产到户”在肥西、凤阳、全椒、芜湖等地普及到 1200 多个生产队。次年又增至 38000 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取得了惊人的增产效果。虽然，在当时就“方向和产量”问题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它的实践效果却早已为老百姓所感受和认识，所以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

十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逐步深入，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后，积极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这一改革把亿万农户推向市场，使广大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把农业生产的责、权、利直接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农业在长期徘徊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后，积极放开绝大多数农产品的购销价格，使农业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转变。

在限制了政府对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生产的行政干预和控制后，农村市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1991 年，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达到 9000 多个。另据统计，在 1990 年的农副产品消费量中，集贸市场提供了 89.1% 的水产品，80.3% 的干鲜水果，75.80% 的干鲜菜，68.2% 的肉禽蛋，50% 的商品粮。

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在探索组织创新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异常迅速，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农业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可能。尤其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为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国农村和农业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步骤。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发展起来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以及经营方式，适应了我国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有利于把农民的生产与市场的需求衔接起来，促进农村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它有利于解决小规模经营与采用科学技术的矛盾，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它有利于扩大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结合，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